

城市化的二元结构分析 框架与我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创新

唐文进 李峰峰

摘要: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二元区域结构理论是城市化问题研究中的两个重要基础理论。在这两种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评述西方城市化研究中以二元化为特征的若干主流理论,发现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城市化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上有局限性,中国城市化道路并非完全依照传统的乡-城迁移模式,城市化的实现并非一定要以城市一元取代农村另一元。

关键词: 二元结构 城市化 极化 创新

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多内涵。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当今理论界颇为流行的城市化基本内涵是指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受众多因素影响的、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转化过程,包括硬件结构和软件结构两大系统的更替和提升,是一种从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镇)集中和聚集的过程,而且是城市(镇)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加、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镇)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向农村渗透的过程。城市化过程既是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过程,同时也是广大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得到极大提高,逐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实现消除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过程。

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我国城市化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本身的产生与发展,即“人口城市化”。这种观点将城市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或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埃尔德里奇(H.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市化”,克拉克(C.G.Clark)将城市化视为“第一产业人口不断减少,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口不断增加的过程”。二是城市化在区域发展和空间规划上的特点和意义,即“空间城市化”。该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内的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等要素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分散到集中、由单一到复合的一种转换或重组的动态过程。与此相对应,西方的有关城市化理论也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研究人口迁移和城市化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型;二是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化的二元区域结构模型。本文将两者结合在一起并通过回顾和评述西方城市化研究中以二元化为特征的若干主流理论,阐述其在城市化研究中的意义,同时分析其在理论上及实践上的局限性,并结合我国农村城市化自身的特点及实践,剖析其若干非二元化特征及表现。同时,论证对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研究可丰富

城市化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内涵。

一、西方城市化理论研究中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

1. 经济结构转换的二元模型与人口城市化

关于城市化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模式,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西方一些经典论著中的推拉模式。譬如,恩格斯认为曼彻斯特的繁荣和人口增长源于其工业化迅速发展所产生的拉力,而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则将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归因于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土地稀缺及圈地运动。在此,恩格斯和威廉姆森分别从城市的拉力和农村的推力两个方面阐释了当时的城市化进程,这其中已经隐含着二元化的分析框架。

1954年刘易斯(W.Arthur Lewis, 1954)创立了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模型。这一模型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农业和工业两个部门,同时将经济发展的过程归结于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即农业比重逐渐下降而工业比重逐渐上升的过程。按照这一模型,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里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很低,而工业部门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工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明显高于农业,其工资水平也必然高于农业,这就促使农业劳动力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这一过程将一直延续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完全吸收,农村工资和城市工资趋向一致,城乡差别逐步消失,国民经济实现现代化为止。

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提出不仅对发展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此后许多人口城市化研究,尤其是通过乡-城人口迁移而产生的人口城市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由拉尼斯(G.Ranis)和费景翰(J.Fei)等人加以修改和扩充的二元经济理论提供了分析农业-工业间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框架。其最突出的贡献在于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非是无供给的,当农业劳动力减少到一定程度时,农业总产出开始下降,引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现代工业部门利润减少,从而农业劳动力平均工资水平和工业部门平均工资水平持平,此时,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单向转移

将停止,农业、工业间劳动力的再次流转将由市场机制决定。

而1969年提出的在乡村-城市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研究中产生重要影响的托达罗模型也是以二元经济模型为基础的(Michael P. Todaro, 1969),其不同之处在于引进了“期望收入”的概念来取代城市的实际收入,从而较好地解释了当时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迁移与城市高失业率持续并存的现象。托氏模型的核心思想在于:(1)农村劳动力的城市转移取决于在城市里获得较高收入的概率和对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失业者风险之间的利弊权衡;(2)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日益严重;(3)注重农业和农村自身的发展,鼓励农村综合开发,增加农村就业机会,缓解城市人口就业压力。

应当指出,上述理论模型虽然揭示了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农业人口转向工业部门的必然性,但将其单独用于人口城市化研究是不完整的,因为这并未能说明为什么工业要集中分布于城市。集聚经济理论弥补了二元经济模型这一缺陷。根据这一理论,城市经济具有规模递增的特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可以提供较好的基础设施、较完善的生产、金融、信息、技术服务,较集中、有规模的市场以及较大的劳动力市场,因而有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聚集效应会吸引工业向城市集中,这种集中还会进一步加强城市的集聚效应,从而促使城市规模扩大。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和集聚经济理论一起,为从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的角度分析农村城市化的产生提供了一个便捷而高度简化的理论框架。

2. 区域发展的二元结构理论与空间城市化

上述理论模型主要是将城市化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待的,虽然也涉及到经济活动和人口的聚集这一空间现象,但城市只是作为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点来对待的。然而,城市是区域发展的产物,城市化过程中并未说明的问题是不同规模城市之间以及城市与其所处区域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研究中显得尤为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高度集中的空间模式。资料显示,1950-199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中居住在百万以上人口城市的比例从22.5%上升到35%,至2000年,全世界24个人口超过800万的城市中,18个位于发展中国家。这种高度集中于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往往直接造成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这种现状仅用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发展的集聚效应已不足以解释,因为这些理论并没有把城市放在它们所处的区域中来考察。

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文献从区域发展的空间过程的角度提出了与城市化有关的理论和模式,且这些理论和模式也是以二元结构为特征的。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的“中心-边缘范式”在综合许多相关学说的基础上描述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中心与外围的空间关系,是二元区域结构学说中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模式。根据这一模

型,产生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为服务和管理的目的而出现的,此后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人口、资本、技术、创新以及权力都向一个或两个具有高生产力的城市集中,从而逐渐形成以最大的城市为中心区,小城镇和乡村为边缘区的二元空间结构。这种区域差异在工业化过程中还会随着资源不断地从边缘区向中心区域转移而扩大。当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而趋于成熟时,上述过程就会向边缘区扩散,使边缘区也得以发展。这时通过国家中央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的主动行动,以及整个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高,区域差异得以缩小,空间平衡得以扩大,最终将形成仅有最低必要限度区域不平衡的完全一体化的空间经济。这种模式的另一特点是将区域发展看做是一种创新和现代化在区域聚落体系中自上而下、自中心向外围扩散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是创新性变化的中心,因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理论与其相关的观点一起被称为“自上而下”的空间发展理论,它一直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空间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主流指导思想,也为从区域空间过程的角度研究城市化过程提供了重要理论框架。

二、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特点及其局限性

上述二元分析框架虽然在西方相关学科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有重要影响,但也存在着缺陷。目前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二元分析框架的局限性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1. 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显著特征

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城乡划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对立部分。在这种概念框架之下,乡村被等同于传统的农业部门,城市被等同于现代非农业部门,经济发展过程即是乡村劳动力通过乡-城迁移转移至城市的过程。这一过程已为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所证明,因而也必然为发展中国家所重复(Michael P. Todaro, 1969)。而乡村非农活动在整个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往往被忽视。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乡村并不仅仅被动地向城市释放劳动力。琼斯教授根据其对于东南亚国家所做的长期研究,指出在这些国家乡村劳动力中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在不断增加(Gavin W. Jones, 1991)。这种现象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则表现得更为明显,由农村工业化所推动的农村城市化,无疑是这一时期中国城市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哈肯伯格(Robert A. Hackenberg)早在1980年也注意到在发展中国家,一些乡村地区正在被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基础设施和行政管理方式所渗透。他将这一过程称为“分散的城市化”,并认为这种城市化方式为分散式的经济发展和新型的空间和社会变动带来了新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麦吉等人还提出了“扩展大都市区”的概念,刻画出亚洲国家一些大都市周围地区在过去30年里所出现的农业和非农业活动并存,非城非乡,但又表现出城乡两个方面特点的地域类型。这种地域类型虽然在统计上常被官方划分为乡村地区,但其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产业却相当发达(T. G. McGee, 1991)。麦吉和金斯伯格等学者根据

这种现象提出了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并认为在亚洲国家,那种认为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将持续存在的传统观点必须加以重新评价。因而,二元化分析框架不仅不符合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乡村的实际情况,而且导致城市化研究中的一些偏向,这种偏向的一个显著例子是将城市化简单等同于乡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忽视乡村地区本身转变为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或将其与人口迁移混为一谈。

2. 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理论假设缺陷

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聚集经济理论,城市化的一个主要机制是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变所带来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在城市的聚集。作为一种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总体趋势的反映,这种理论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一旦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并不如想象中那样严格。盖文·琼斯教授曾对10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46-1980年间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水平和就业非农化水平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不同的,非农化水平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比值有着一个较宽的幅度。这表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与经济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Gavin W. Jones, 1991)。这种关系的灵活性显然与前述城乡差别趋于模糊,非农活动在农村地区越来越普遍有关,因为农村非农活动使得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无需通过传统的乡-城迁移即可在乡村地区就地实现。麦吉和金斯伯格等学者在提出前述乡村“聚落转型”的概念时,即指出亚洲国家正在经历一场没有大规模乡村迁移的乡村城市化过程。城市化和经济结构转变的这种灵活关系还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和不断改善的交通通信条件有关。麦吉等人提出的“扩展大都市区”的重要特征中有两个——“类似于城市的人口密度”和“经济方便的交通通信条件”,两者在这些地区的“聚落转型”过程中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上述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表明:在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所需要的空间聚集并不一定需要通过传统的乡-城迁移模式,以一元取代乡村另一元的结局来实现。因为在许多乡村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已使许多乡村聚落具有或接近城市聚落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而交通通信等条件的改善,尤其是成本较低的两轮摩托、客运汽车、卡车等交通工具的日益普及,又极大地方便了人员货物的流通。这一方面使乡村劳动力可以以通勤的方式进城工作而不必永久性的迁往城市;另一方面使乡村地区易于接近外部市场和资源,从而为非农活动在乡村进行铺平道路。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城市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人口迁移,而在城市内部由于汽车交通的普及,企业和人口必须密集分布于市中心及其附近以利于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情况迥然不同。上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和企业集聚条件和方式的改变,传统的二元分析框架不再适用,需要用新的理论框架来加以解释。

3. 城市化二元分析框架的逻辑推理缺陷

二元区域结构理论在研究城市化过程中聚落体系和区域空间结构变化上也存在着缺陷。首先是极化现象,尤其是在

发展中国家所出现的十分严重的极化是否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还值得进一步商榷。而事实上,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的历程并不能一致支持空间极化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在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初期,10万人口的城市就已算是大城市,而就是这些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只能算作中小城市的地区,它们在工业化早期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一个世纪(1750-1850年),曾有一个时期欧洲的城市化是以城市自下而上的发展和小城市地位的提高为特征的,而发展中国家高度集中的城市增长模式是20世纪才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且中国台湾省的经验也说明:如果采取一定的社会经济措施,高度集中的人口分布在经济和人口城市化的高速发展过程中可以避免。所有这些都表明,空间极化并非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其次,对于极化发展所造成的效果,一些学者并不乐观,他们认为,大城市的高生产力并不一定是聚集经济所造成的,它也可归因于由于城市偏向所造成的较好的基础设施和较高质量的劳动力(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 1982)。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期望极化逆转会自动发生则更是幼稚的(Gavin W. Jones, 1991)。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区域不平衡问题十分严重,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其政府又缺乏必要的干预能力,要实现区域差异自动趋于缩小的阶段是十分困难的。因而,对于这些学者而言,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首位度偏高是一种被人扭曲的不理想现象(Alan Gilbert and Josef Gugler, 1982)。

三、我国农村城市化的若干非二元化特征及表现

在对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区域结构理论进行回顾和评述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这种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其对二元化发展模式的突破。因此,加强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将会在突破城市化的二元化理论框架局限、丰富和发展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上发挥重要作用。

1.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它的产生与发展已使我国许多地区,尤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乡界限日趋模糊,乡村地区已具备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功能和特征,从而突破了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199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已从1978年的2830万人增加到1.35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中通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最为成功的国家(陈吉元、庚德昌, 1993)。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 and 劳动力从农业向乡镇企业转移,各类乡村城镇也呈迅速发展之势。1996年全国县建镇的数量已从1998年的2850个增加至10871个,县镇人口1978年为5316万人,1996年增至3.48亿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879万人。这种以农村非农化为主要推动力的农村城镇化过程不仅在大城市地区,如苏南、珠江三角洲等地十分突出,而且在一些大城市影响较小的地区,如温州、闽东南等地也相当发达。农村非农化、城市化

的结果不仅使相当一部分农村人口就地转化为城市(镇)人口,而且使部分由于城乡迁移政策而未彻底实现地域转移的农村人口在从事职业、生活方式和居民点形态上也已具有相当的城镇特性,成为准城镇人口(崔功豪、马润潮,1999)。

2. 人口密度和交通通信条件对二元分析框架的突破

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变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前所未有的高人口密度和不断改善的交通通信条件有关。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研究可进一步丰富在这方面的认知。就人口密度而言,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密度之高在世界上也是十分突出的。中国有10亿人口分布在仅占其国土面积30%的土地上,这一部分的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354人,比人口集中的比利时人口密度还高。笔者通过比较福建省沿海地区和与之面积相近的比利时、荷兰时发现,福建省沿海地区1996年的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95人,分别3倍和4倍于比利时和荷兰工业化时期的人口密度,许多村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均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的一些城镇聚落不相上下。这些地区的交通通信也十分发达,公路运输尤其方便,因而虽然远离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却通过公路交通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其内部也由于公路交通高度发达,使企业布局分散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上述例证说明,我国高人口密度和较好的交通通信条件下的乡村城市化方式具备其自身的国情和特色,尤其是在一些与大城市距离较远的地区可进行这方面的有益探讨。

3.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对二元区域结构理论的突破

如前所述,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城市化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即区域城镇系统首位度的降低。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和福建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在发展早期出现的非极化现象不仅是对传统二元区域发展理论的挑战,而且对进一步论证本文前面所涉及的极化在区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效果等问题有重要作用。

首先,对我国农村城市化研究可弥补在二元分析框架下区域发展理论对“边缘”地区在区域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忽视。许多研究表明,中国农村工业化的主要动力来自农村地区本身。无论是从在中心边缘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创新的来源和传播,还是从资金来源来看,位于“边缘”的乡村地区从发展早期就扮演了主要角色,而不像传统二元区域结构理论所认为的那样要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后再由核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带动。无论是远离大城市的温州模式、晋江模式,还是受大城市影响较大的苏南模式,地方社区主动性和农民群体或当地社区的资金都起了主导作用(崔功豪、马润潮,1999)。农村边缘地区在区域发展早期的这种积极作用突破了极化发展的模式,具备我国农村城市化自身的特色。

其次,我国农村城市化可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提供新的内容。从前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城市化带有许多“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烙印。这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动主体来自农村社区和个人,乡镇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占绝对优势等特点上。但我国的农村

城市化又与传统的“自上而下”发展战略有着重大差别。其一,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战略十分重视工业发展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上的作用,这与前述“综合区域发展战略”和“地域发展方法”等战略忽视乡村工业的特点迥然不同。其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在不断城市化的过程中与国际、国内经济体系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与传统的“自上而下”战略所倡导的“选择性封闭”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事实上,从二元城市化分析框架来看,我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突破了城市工业、乡村农业以及城市和农村相对立、乡村发展必须由中心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主导的传统观点。它显示出,大规模的工业化与一些“自下而上”发展战略的主要因素之间是可以兼容的,而且可以收到比传统的“自上而下”发展战略更好的发展效果。

四、结论

城市化的实现按照传统的西方二元结构分析框架是通过简单的乡-城转换模式而实现的,即以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城市一元取代经济落后的乡村另一元,然而,在分析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区域结构这两种理论模型基础上,却发现其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通过对中国城市化在改革开放后的历程研究(主要是指通过农村工业化所推动的农村城市化)发现: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具备若干非二元化特征,突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分析框架,具备自身的国情和特色。同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也丰富了城市化内涵,发展了城市化理论。

参考文献:

1. Lewis, W. Arthur, 1954. "A Model of Dualistic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6, pp. 46-51.
2. Fei, J. C. and Ranis, G., 1961.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7, pp. 533-565.
3. Todaro, Michael P., 1969.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59, No. 1, pp. 138-148.
4. Jones, Gavin W., 1991. "A Guide for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6, pp. 279-312.
5. Mcgee, T. G., 1991. "An Examin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Urban Studies*, Vol. 36, No. 3, pp. 431-437.
6. Gilbert, Alan and Gugler, Josef, 1982.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Urbanization: The Emergence of an Idea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Urban Researc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Local Governance Second Annual Meeting, Makati, Metro Manila, July*, pp. 23-27.
7. 谭崇台 主编:《发展经济学》, 186~188页,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8. 辜胜阻、简新华 主编:《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 78~83页,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9. 王小鲁、夏小林:《优化城市规模, 推动经济增长》, 载《经济研究》, 1999(9)。
10. 陈吉元、庚德昌:《中国乡村-城市转型的动力和类型》, 载《经济地理》, 1993(7)。
11. 崔功豪、马润潮:《论城市化模式与途径》, 载《城市研究》, 1999(4)。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长沙 410079
(责任编辑:Q)